

# 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

〔美〕林 南

近几年来，社会学中国化已成为一个热门题目。一九八〇年在台湾曾经举行过题为“社会与行为科学的中国化”的讨论会<sup>①</sup>，许多台湾及香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纷纷赴会。最近一次则是一九八三年三月在香港召开的以“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为题的讨论会，与会者来自中国内地、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社会学中国化”再度成为人们的主要议题之一。虽然从社会学出现在中国时开始，“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注意，但是，我以为正是由于下列几个因素，才使它再次成为人们的中心议题。

从历史上看，一九五二年，在中国内地高等院系调整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学系，使得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中断了其发展。取消这门学科的根据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层次的社会理论，能够解释社会与心理上种种现象的变化。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社会学系和社会学课程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设立（首先是一九五六年建立的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接着是中兴大学、政大、台大、东吴及其他院校的社会学系）。年轻一代的社会学者多半到国外，尤其是到美国就读于研究院，接受更高深严谨的社会学训练。这批学人中许多都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完成学业，回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从事与社会学有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而到七十年代末期，这些学者逐渐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这个趋势似乎仍在发展之中。这些年轻学者在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逐渐察觉到，来自西方的学术思想和他们身处其境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常常格格不入。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内地于一九七九年恢复了社会学。先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一九八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继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社会学研究所，再接着社会学系也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上海大学（前身为复旦大学分校）设立。各省区社会学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全国社会学会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在武汉召开。一九八三年四月在成都召开了社会学研究规划会。会议决定了未来几年全国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小城镇研究；（2）都市区域的家庭问题；（3）人口问题。在理论方面，仍然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思想理论的最高指导，但是也指出这个理论并不是也不能完全了解所有的实际社会问题，也无法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具体的解决途径。学术界深信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应由中国学者来发展，应为中国人民和政府服务，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出方案与线索。他们也同意来自国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技术及各学派思想可以在中国进行研究讨论，但不应盲目地、无选择地吸收这些知识。社会学应以研究解决中国问题为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sup>①</sup> 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82年版。

第三个因素是由于近年来远东地区在政治经济体系上的变化与改进，尤其是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地。虽然各地变化不一，但一般而言，整个地区的经济逐渐繁荣，政治意识形态趋向自由温和。当然，社会“问题”也随着增多。虽然本文不准备讨论这些变化以及它们的形态，但是我认为这些变化给社会学以极好的研究和发展机会，从而使这些身处不同政治制度与地理位置上的社会学家有机会发表意见，进行直接间接的交流，进而对“规范性”（normative）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作出评论。

我认为，以上几个结构上的因素，对海峡两岸的中国社会学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力，促使这些学者再次为找寻具有“本土性”特征的社会学而努力。

但远居美国的华裔社会学家一直未参与这项中国化“运动”，原因有好几个，例如，这些学者们之间年龄差距很大，存在代沟。有几位早于一九五二年以前就开始了学术生涯，而他们目前多半已退休了（例如，杨庆堃、李树青和周荣德等教授），也有好几位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生涯的（包括刘融、牛康民和田心源等教授），这几位目前仍在工作岗位上发展事业。剩下的华裔社会学家多半于七十年代才开始教学研究工作的，他们一直忙于为自己的前途与事业而奋斗（萧新煌最近告诉我，年轻一代的社会学家中，我属于年纪最大的了。我于一九六六年开始教书）。因此，社会学中国化在北美并非一个受重视的题目，因而也非这些旅居北美的华裔社会学家的研究重点。多数华裔学者对社会学中国化缺乏个人兴趣及亲身体验。另外，这些华裔学者也可能在中国化运动中被视为“局外人”。

我很高兴地在此指出，近来这些“局外人”开始对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发展情形表示关怀与兴趣了。他们之中有许多已直接到中国大陆及台湾访问讲学，从事研究工作，出版研究论文，推出了一些学术报告和专辑。由于这些学者本身职位已逐渐稳固，并且同远东地区社会学活动的交往愈来愈频繁，他们参与“中国化”运动将愈趋积极。虽然他们缺乏在中国环境中参与实际研究工作的经验，但我深信他们站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上：一方面能够很密切地观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学发展趋势，或许能更容易体察其中的缺陷；而另一方面，能够在较超然的政治和思想立场上来检验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些学者对这个运动的兴趣及努力对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组成的“北美华裔社会学学会”有一定的推动力。这个刚成立的学会定期协调它的会员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们的学术活动，当然这些学术活动也因距离遥远而产生一些困难及不便。但总的来说，北美区与亚洲区华裔社会学家学术上的交流只会更充实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

以上是我个人从“社会学之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化运动。下面再探讨若干与社会学中国化有关的议题，目的是严谨地检验目前所关注的问题和它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希望能提供一些具体建议，俾使这个运动未来有丰富多彩的发展。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下社会学中国化的定义。

## 中国化之定义

“社会学中国化”在本文中是指“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纳到社会学里”。这个定义与“中国社会学”这个名词不同，后者仅描述发生在中国所有涉及社会学的学术性及专业性活动。因而我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一个可以超越地域界限的工作，它所涉及的社会文

化特征及民族性包括了结构、团体和个人各个层次，而这些特征及特性可融合于理论或方法论上。我们的定义和如何使社会学适用于中国社会是不同的，后者着重在中国社会里促进对社会学的了解及运用。这个工作有其重要性，也可能导致社会学中国化。但是强调如何使社会学适用于中国社会所获得的成就并不等于中国化之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中国所做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工作都属于运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这类学术活动虽然很普遍（据估计，中国社会学家人数在三十年代末期和四十年代初期仅次于欧洲及北美），不过并未导致社会学中国化。评判社会学中国化是否成功应该依据社会学里所获得的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与民族性的多少而断定。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过程也许更为明确。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由持续不断的对特定群体、社区、文化和社会的特征做分析及解释累积而成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研究的产生多半由于对当时社会学知识的不满。这些不满可能源自所累积的社会学知识无法充分描述及理解某些重要社会现象和过程，或者根本缺乏对这些现象和过程作出解释的能力。唯有设法融合那些具有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的资料于社会学内才能使社会学继续发展壮大。几位社会学大师，诸如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等都是由观察与分析那些包含历史资料和一些在时空上具有独特性的资料开始，而对社会学做出重大贡献。即使象工业化这样一个似乎是全球性的演变过程，这些学者也觉察出它对各个不同的地区或社会所造成的不同的影响。当工业化的过程冲击到不同的社会、层次和人群时，它同时也赋予某些概念在理论上的明确意义。譬如说，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社会常规与制度的效率，以及社会中个人的适应与失调。后来，美国社会学以研究迅速变迁中社会的都市社区为主要内容，学者们逐渐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研究发生兴趣。近来德国社会学派针对经验科学过程独占社会现象研究的反应，再度显示出二次大战以来学者对科学是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力量这一观点的怀疑态度。

因此，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仅要能吸收不同文化与社会特征，同时必须依赖持续不断的注入这些资料才能使这门学科兴旺。这些特征愈新奇独特，这门学科则受益愈大。目前许多学者对社会学的停滞不前大声疾呼，正反映出由于这门学科的主要资料来自欧美社会，因而导致这门学科目前过于划一而引起的局限性。这也使我们更有理由认为研究那些与欧美社会不同的文化与社会是复兴社会学的必要步骤。我认为从这一个世界性的角度才能看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质意义。

上述分析对参与中国化运动的学者们具有策略性的含意。这个任务在观点上必须是较全面的，在实行中则须是广泛的。若把中国化的社会学视为一个仅有中国人可参与的运动，而且排斥非中国特征的方法与资料的社会学，那是不正确的。中国化社会学应该有其世界性的意义，而把复兴社会学当作它的主要任务。

## 对目前讨论的评估

我对目前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仅局限于对一些于研讨会的论述和我个人与中国内地和台湾等地学者们的讨论。这些论文与交谈涉及到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有关中国社会学研究工作的现状，第二个是针对可能促进中国化过程的方式。下面我简略地评论一下这两个问题。

对目前工作的评估可集中于四类问题上。第一类，也是最明显的，目前中国社会学研究工作在本质上属于应用性的，理论、方法和方法论均由西方直接转过来，很少有创新性的研究。这类应用性的研究工作很少有机会能自经验科学中产生理论性的议题，因此这些研究工作不仅不具备理论性，同时也经常不够学术性。第二类问题，当资料与理论配合时，经验性资料通常仅用于说明或考验理论，很少能通过分析和解释资料的过程，采用归纳方式提供新的理论见解<sup>①</sup>。第三类是盲目地采用西方理论与方法，而不检验它们的基本假设和价值是否适当。这类批评多半强调实证主义研究方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好也反映于中国社会研究工作中<sup>②③</sup>。最后一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工作仍然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而这类限制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社会学家本身的。社会学研究工作通常在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或者在非常低层次的抽象概念上进行。这些低层次概念显然不会对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发生质疑。

我须马上声明，上述这些问题并非仅存于中国社会里。事实上，这些问题可能是在任何社会里进行“规范性”科学研究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不过，只有认清这些问题才能导致学术上的突破，或者发生库恩（Kuhn）所谓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

针对上述问题，一些中国社会学家提出了较具体的批评和方向。批评的内容大约可分为三个大类。第一类针对那些对外来的社会学方法、工具作盲目的引用而发。叶殷政（一九八二）指出，许多中国社会学者认为“移植”、“加工”西方社会调查就是社会学研究。这类批评对社会学研究最浅薄的一层加以指责。第二类批评进一步对整个实证主义提出警告。高承恕（一九八二）等指出，任何一个理论若仅以实际的经验为依据，它一定有普遍性的偏差。因为任何实证理论都有它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从事理论建设的学者本身的认识、诠释和觉悟性。所以，盲目引用西方实证方法来在中国进行理论建设，不仅不够，而且一定有偏差。中国社会学家应该省悟本身文化、风俗的先决性，不但要认清自己的诠释性本质，而且应对这种诠释性有反省、批判的精神和能力。第三类批评提出中国社会学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文化价值与经济结构的了解上<sup>④</sup>，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学，才能被纳入世界社会学体系之中（叶，一九八二）。

这三种批评都是有见地、有意义的。它们针对过去与当前在中国进行社会学建设的偏差和局限提出警告。我想这些批评并不是用来否定中国社会学者数十年来的努力和成果。这些努力和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必须肯定和赞扬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评判当作中国社会学前进的历史过程的标志。在一个学科范畴落后的地区或国家（譬如说在中国）的社会学，它的历史进展有一定的过程。最先一步是如何传播这门学科，使这门学科在当地的政治、学术领域中有立足之地。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指出这门学科对矫治该社会的“疾病”和弱点可能有的贡献或功效，是这初步工作必须做的。因此，它的主要方式是功利性的，口号是实证的（“洋为中用”）。夸大，这学科是诊治这社会病弱的至上良药，似乎是这学科先驱者必须喊的口号。在中国内地，社会学在初创时期（一、二十年代），和现在的恢复时期（从一九七九年迄

① 肖新煌：《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初探》，《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69—89页。

② 高承恕：《社会科学中国化之可能性及其意义》，《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31—50页。

叶殷政：《从中国社会学既有特性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115—151页。

③ 金光天基：《社会学的中国化：一个社会学认识论的问题》，《社会及行为研究的中国化》，第91—113页。

今)，这种传播性工作是很普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这一学科已被政治、学术界认可后，研究工作就必须展开。因为学者本身和政界领导阶层都有高度期望。在“一针见血”、力求时效的驱使下，“移植”和“加工”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简易速成的内地。从正面来看，这也是学科的学者们吸收经验、增长体悟的途径。中国内地三、四十年代，台湾六十年代迄今，似乎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用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到一定程度时，这个“半新”学科就会经历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这个学科的学者从累积经验中体悟到的。同时，这些学者也受到当地政界领导阶层的再度挑战：“到底这学科是什么玩意？”这个体悟和挑战，如果没法进一步突破和接受，这个学科就可能面临学术界“二等公民”的身份。我想，最近港、台、美讨论社会学中国化问题，就是这一阶段的标志，也是在可能突破和没落分歧上的重要经历。

有了这些警告和批判是个好的开端。但是，仅仅指出当前的危机和缺陷，或借引另一种看法<sup>①</sup>，而不更进一步探讨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那么整个学科就可能走向清谈的道路。批判必须引导出建设性的步骤，才能使这一学科生根、壮大。我们目前最需要是如何接受这个挑战，对社会学中国化提出具体的方向和议程。以下，仅我个人所见，抛砖引玉，提出一些基本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就此与诸位学人切磋，引出更多看法和主张来。

## 社会学中国化之方向

从事社会学研究是一个包含归纳与演绎的相互影响过程。根据经验性资料建立和证实一个理论结构，然后再经由经验性资料检验这个理论。一般在讨论时并未对归纳与演绎两个过程中所采用的经验性资料的本质加以区分，也未对“理论的建立”和“理论上引用”的资料的鉴定加以区别。我认为针对社会学中国化，有必要将上述经验材料划为两类，一类是透过归纳过程形成新理论所采用的“初次证据”(Primary evidence)，另一类是经由演绎过程检验和修改既存理论的次级证据(Secondary evidence)。

这种划分在考虑如何运用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与民族性于社会学研究时就显得有意义了。社会学中国化过程引用中国社会与民族的特征和特性作为初级和次级证据。作为次级证据方面，旨在从事“规范性”的科学研究，设法检查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对这方面的过程无需再作注解。本文的讨论将集中于初级证据上，强调从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与民族性中建立理论，我认为这才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动机与努力方向。

这个方向对中国化过程并非独特的，但是它代表了对社会学知识累积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欧美学者正因为运用了那些代表他们社会与民族特性的初级证据构造社会理论，进而建立了社会学的内容与体系。因此，一旦这些理论和方法成为典型后，如何运用次级证据验证和修改这些理论和方法就仅仅具有较低层次的意义。次级证据一向被用来评价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一旦某些具有特性的初级证据与理论和方法结合后，这个结合过程和资料的特性往往

① 黄俊杰：《对高承恕论文之评述》，《第一届历史与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册），中央研究院三民所丛刊（8）1982年版，第41—44页。

不再受到那么多的注意，主要目标转移到这个理论的检验和次级资料的运用。这就是“规范性”科学的本质。

假若用来验证既存理论的资料和当初建立这个理论的资料之间有重大差异，那么这个理论的潜在危机正是一个理论范型发生转移的必需步骤。但是库恩（Kuhn）的文章中并无说明这类转移是否或何时会必然产生。我个人以为资料本身的差异并不足以导致理论的必然“革新”。其必然性必须由下列几项因素促成：（1）必须有一群为数不少的学者参与并采用这些资料作为初级证据（一群富有批判精神的学者“Critical mans”）；（2）他们协同努力，有系统地说明和发挥即将形成的新理论（一个有组织的共同见解“Organize consensus”）。只有当一群富于批判精神的研究工作者组织起来以中国文化特征及民族性为初级证据而从事社会学理论的建设，社会学中国化才有成功的希望。当然，这个过程的最后成功必须经得起次级证据对新理论的检验。现在让我进一步叙述一下这些理论形成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初级证据必须与那些用做建立及检验旧理论所用的资料确有迥异；（2）必须有系统地组织一批学者从事该项研究。

## 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议题

虽然目前考虑社会学中国化有关之理论体系尚属言之过早，但鉴定出一些与现代社会学理论所用之资料不同的“中国性”要素来做议题是重要的一步。下面我试举一些议题可考虑的要素。

（1）家庭结构与亲属关系构成个人与社区之间的主要关联。纵（祖先）横（扩大）家庭结构可能是构成中国社会里个人与社区之间的团结和冲突的主要成分，这方面可能与西方社会中宗教的功能成强烈对比。社会里的职权基本上和家庭结构里的职位密切关联，因而导致家庭结构中每个成员的巨大差异（父母亲属关系或对祖先的认同不仅确立，同时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有些学者在台湾搜集了一些有关家庭结构的有趣资料<sup>①</sup>，显示出西方学者所发展的有关中国社会中家庭成员的分类是不恰当的，我们应认清中国家庭功能是极繁多的，它对社会结构的意义也是深远的。

费孝通教授认为与西方所讨论的直线型家庭结构模式（家庭大小因都市化及工业化过程而逐渐递减）相比较，中国家庭仍然具有相当的伸缩性。纵使在都市区域，虽然家族成员减少，但家庭分子在机会和条件可能情况下，仍会聚集组成较大的家庭，这个弹性理论（我的说法，非费教授的）反应出中国社会里家庭观念的稳定性和社会意义。有些中国人虽然数代以前已移居到另一地区，但他们仍然与“老家”保持密切的关系。所有的家庭权责并未改变，所以这并不仅仅是西方“家庭世系”所研究的问题。我们无法确定这个家庭弹性观念能持续多久，不过各种资料充分显示出中国社会里家庭，而非宗教，是维持团结的主要社会要素。中国人由“大家庭”中找寻力量和动机，犹如欧洲民族自宗教“家庭”中寻找这些力量和动机。同样，冲突与分裂也经由家庭结构而发生，因此，在中国，任何有关个人与团体之

<sup>①</sup> 谢继昌：《中国家族研究的检讨》，《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255—280页；庄英章、陈其南：《台湾研究的一些启示》，《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281—309页。

间关系或社会结构的理论均须以家庭为主要社会单位。

(2) 中央集权式的结构盛行整个中国社会的每个阶层。中国社会过去三千年来一直是由一个阶层分明的超然结构概念在操纵着。这是与欧洲的城国结构不同的。这个概念也通行于中国社会中最低和最小的单位内，每个分子的身份高低均在这个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里得到明确的描述与界定。态度与信仰也均由对中央权威的绝对服从而建立。个人行为的好坏，奖赏或处罚也均根据中央权威体系里的规范而判定。对这类题目进行分析研究时，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诸如个人自由较社会自由更重要的价值观）。由于对中央集权基本的膺服，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多趋向于地方化，而不与高层权威结合。所以这些问题之解决途径也需从当地寻求。这样一个“个体性”经营事业的特性，也解释了社会、经济和人口上许多问题的处理都有地方化的趋向。两件近来发生于中美两地的事件可以说明上述现象。在中国最近开展一个严厉处罚刑事罪犯的运动，大众舆论强调指责社会里的这些个别坏分子的不良行为；而在美国，两位美国人因传递高度机密军事情报给不友善国家而被捕，大众传播系统却着重报道安全系统之不完善，几乎完全排除了任何明确地指责这两位间谍的“不道德行为”的报道。

(3) 在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里，社会流动不仅经由“大家庭”体系的关系，同时要求某些维系这个体系的技能。完整的教育考试制度与军事技能的培训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在建立这些制度时，奖赏是给那些既能通过考试，同时又表现忠贞的分子。譬如，在教育考试上，笔试与口试均强调个人修养（知道行为和所在阶层地位上的一致性）和对中央权威的忠贞。笔试题目多半是关于为人处事之道德和规范。在军事技术竞赛上，个人品德（坚忍、耐力和对权威的服从——不论这些权威是武术师傅、地方官吏还是中央官员）与技能同等重要，甚至有时品德更重要。所有行为相互作用模式均以上述原则为准绳。文崇一<sup>①</sup>对中国历史上的报仇与报恩的研究充分说明了上述现象。

(4) 语言文字的大统一是一个社会体系继续运转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统一的文字对中国社会的继续存在和维系毫无疑问具有很大贡献，虽然中国方言繁杂，人口特征也迥异。粗略地从世界上能持续恒久的国家可以看出，语文的统一与否是社会团结或冲突的重要来源。中国文化与文明具有非常特殊的语言特点，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将增进了解社会语文对维系一个社会的功能。

(5) 一个社会的政治地理位置和有价资源之关系对这个社会与外来帮力的历史关系有其决定性。中国位居要冲，历史上西接东南亚资源以及近世纪来东连太平洋诸岛屿的航道，都帮助我们东西方历史上发展的双边关系以及至今继续不断的时松时紧的国际局势有所了解。我猜测这个过程将会继续下去。对一个社会的地缘政治意义的了解可能与每个社会里内含的经济资源的实用价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世界体系观点对我们了解欧洲城国的历史发展有助益，不过亚洲和中国也有很多丰富的历史资料，有待我们从全球性观点来了解这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史。

上述几点旨在说明许多资料可提供我们作为建立社会学理论的初级证据，这些资料不仅可修改充实现有理论，更有可能建立有意义的新理论。这些资料并不是无关联而独立的。例如，中央集权概念与大家家庭制度里的连续不断的相互关系作用是值得深入研究与分析的。我

<sup>①</sup> 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82年版。

也深信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与民族性里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资料具有同样的或更多的机会成为新理论发展的初级证据。

假如我们都深信作为初级证据的资料是存在的，那么社会学中国化还需要一群富于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组织起来努力朝使用这些资料之方向迈进，展开理论建设的工作。本文主张有系统地组织这些社会学家，集中兴趣，从事运用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与民族性的初级证据的研究。近来在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不断增加的社会学家数量以及他们发展的方向及兴趣都使我觉察到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努力的可行性。我呼吁各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们研讨出一个共同的计划。我确信，其他社会学家，尤其是那些具有中国血统的社会学家们，不论他们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会热情参与这个研究工作。

## 结 论

最后让我们提出一个带有启发性的但也是积极的结语：社会学中国化必须被视为是导致对所有人类社会生活了解的努力。这个大前提值得一再强调。任何狭义的意向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注定会失败。“闭门造车”的教训必须记取。中国化的计划必须是广泛的，必须动员最优秀的人材，提供必需的训练，共同参与有组织的、团结的和开放性的研究、分析、讨论和交流。它最终在于重新整理那些根据欧美思想和资料所建立的社会学理论。

作者附注：本文初稿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向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西部年会”会议中宣读。承涂肇庆博士协助翻译，谢文整理，仅此致谢。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 琢